



法学研究

法理法史学

宪法行政法学

民商法学

程序法学

刑事法学

经济社会法学

国际法学

搜索

关键字

检索内容

检索字段

排序字段

检索方式

检索

最新发布

- 试论我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
- 试论民族法学的性质、理论体系及其...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五...
- 抽象而具体的公共利益
- 为什么我国应实行法治与德治并举模...
- 法律意识视域下大学生宿舍行为失范...

点击排行

- 老子守柔思想的现代法律价值
- 朱苏力：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
- 网络表达的民主考量
- 公丕祥：全球化、中国崛起与法制现...
- 司法公信力的构成要件
- 尹宝虎：法学创新的关键是发展实践...

## 公丕祥：全球化、中国崛起与

阅读次数: 503 2010-04-06 16:16:41

### 全球化、中国崛起与法制 ——一种概要性的分析

**摘要:**中国正在重新崛起，这是当代全球化进程中一  
际金融危机，加剧了全球政治力量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  
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法制现代化或法律发展的中国  
特殊的价值与意义。我们需要从全球的视野，揭示全球  
理，把握全球化与中国崛起背景下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运  
**关键词:**全球化；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崛起；中国模式

#### 一、问题的复杂性

伴随着当代全球化的时代进程，中国崛起现象成为  
一个话题，而全球化与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的中国法制现  
内外学术界研讨的重要学术领域之一。在我看来，全球  
当关注当下中国的法制问题，而当代中国法制的变革、  
中国法律问题的核心要义。[1]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制现  
独特的历史品格，展示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迫切需要  
球的视野，深入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理  
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对法律发展的中国模式与中国道

如同全球化进程一样，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历史性的  
全球化浪潮的“蠕动”，中经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  
始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迄今已经经历了五百年左右的  
浪潮中的中华帝国大致处于世界或亚洲的中心，而第二  
世界边缘化了，那么正是借助第三次全球化运动的汹涌  
多观察家认为，中国充分利用了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战略  
起的大国那样，成为“世界工厂”，改革开放的革命性  
中国是第三次或当代全球化进程的最大赢家之一。美国  
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  
人不大认同中国的崛起，认为当下的中国只是一个“表  
一切似乎显得很强大，但是一旦从近处观察中国，所谓  
失。然而，无论人们对中国崛起持有何种看法，当代中  
负责任的发展中的世界大国，中国已经或正在崛起，这  
实。应当说，这是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主流话语。  
次全球化浪潮持有正面的积极的评价，一尽管这次浪潮  
估。

实际上，当代中国崛起的真正的标志性形象，乃是

象。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成了破坏性的影响，而且严重动摇了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化解这场金融风暴，摆脱全球治理危机，世界各国特别协调应对之策，2008年11月的华盛顿20国集团（G20）金融峰会以及

2009年7月的意大利拉奎拉G8峰会（实际上是G8+1）。有趣的现象是，所谓“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不仅积极广泛地参与了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与表现出来的坚定信心与欧美诸国的低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兴起的“全球领袖”。而在这“金砖四国”中，中国的作用被广泛认为，正是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经过30年改革，中国展示了全新的形象：自信、诚实、内敛和负责任。这种崭新的、决不不当头的根本国策，又展示了有所作为、担当责任的、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关系人类社会命运的重大挑战。

于是，许多政治家和学者似乎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正扑面而来。比如，最近，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研究报告网站（2009年6月24日）的一篇题为《货币、文化与世界》的文章中认为，中国人不是从民族而是从文明的角度看，文明国家才是地质构成，正是后者给中国人带来了先前遵循西方模式的世界，尽管这种情况不会很快出现。不同的时代正缓慢来临，中国将对这个时代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面临着—个严肃的课题：如何估量中国崛起的文明意义？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在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时代面貌，换言之，如何观察中国法制现代化运动的未来？这些问题做出必要的阐释。

## 二、中国的全球地位及其变动

在全球历史的演化进程中，东方与西方的关系及其作用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处于原初的中心地位，成为全球性现代化的中心地区，而东方则处于边缘或半边缘地区。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其代表作《世界体系》中描述了世界经济体的中心与边缘的变动过程，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的兴起，经历了三个霸权周期，产生了三个霸权国家：15世纪中期的葡萄牙、19世纪中期的英国和20世纪中期的美国，世界格局全球化。[2]在沃氏的心目中，东方在全球发展进程中的位置才是世界历史舞台上的经久不变的主角。与这种“西方中心论”不同，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试图对1400年以来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化进行重新解说。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弗兰克极力证明，从15世纪开始，并不是欧洲时代，而是亚洲时代，中国则是世界的中心；直到19世纪之前，“中央王国”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的这种位置和角色的现象之一，它吸引和吞噬了大半个世界。[3]因之，弗兰克的分析与结论，打碎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依据。这样看来，按照弗兰克的说法，可以重新解释。

然而，19世纪以后，世界场景发生了急剧的转换。在工业革命推动下，西欧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迅速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经济和专制政体的樊篱之中，所以不可避免的，先前中国所取代，欧洲开始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中心区域。随着19世纪殖民扩张，中国不仅丧失了中心地位，而且逐渐沦为半殖民地。西方列强凭借武力和商品，强行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处于边缘化状态。卡尔·马克思揭示了近代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结果，指出西方近代商业文明的入侵，使中国这个“最后

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被消灭，”从而逐渐瓦解了旧有传统中国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梦、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

关于19世纪中国的世界地位的历史性转换，有的学者转变这一概念分析工具来加以解释。在美国著名的中国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西方文化的程度的演变，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缩影。朝贡制度是把儒家根据来行使他的政治权力的学说，应用到对外事务上。朝贡的教化，是一种恩典和特权。因此，按照费正清的看法，朝贡制度的性质一样，朝贡制度这个古老的中国制度也是不平等的。虽然皇帝受命于天统驭万民，他宜对一切‘远方来人’表示理应由外来者的俯首恭顺来予以报答。”“一旦外国人得到皇帝的皇恩和俯首恭顺之间的关系就必然要在礼仪的形式上得到赏赐和献礼。于是，献礼朝贡就成为中国朝廷的一项礼制和中华文化。”[5]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古代中国的朝贡制度一直沿用到19世纪初叶。但是，随着19世纪中叶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制度。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清政府与列强在这一条约制度下，传统的朝贡体系彻底崩溃。西方列强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念，逐渐倒转过来，中国的传统秩序中，遭遇到了空前的挑战与危机。在这一条约制度下，新的秩序结构，并不是中国自愿选择的，而是列强借助武力强加给中国的东西，由此形成的新的社会秩序具有显明的不平等。不像是在平等主权国家之间签订的，但实际上，它们是很愿被迫处于较弱的地位，只能听任西方的商业和随之而来的冲击。

更进一步的来看，中国的世界地位的这种倒转在法理上，与以前中国的世界中心地位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在现实上，用费正清的话来说，与早期欧洲各民族通过外向扩张采取了“内向爆破”的方法，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生产方式体系。这种“内向爆破”铸就了国家、社会和文化三者不同的两个主要结果：古代中国官僚制度的发达和农业的繁荣昌盛。[7]这种“内向爆破”所产生出来的力量处于一个自然的演进过程之中，保持着自主型发展的独特性。在中国之前，它并没有因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启动而动摇自己赖以存在的根基；另一方面，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对外域文明法律生活产生了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包括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在内的影响。19世纪之前的绝大部分欧洲学者都对中华法律文化表达过向往。在近代中国的逐步确立，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与法律发展的进程。是中外不平等条约制度的法律表现，是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的历史产物。在领事裁判权制度下，外国列强肆意侵犯中国法律发展的自然的自主的进程被打断。曾在晚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竟然荒唐地认为，中国放弃领事裁判权的主要理由，而外国人放弃这种司法特权的前提是中国的法律制度的改善。[8]因之，晚清法制改革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通商口岸回领事裁判权；这场法制改革的基本策略，就是“将采而务期“中外通行”。[10]而这场十年法制改革的直接后果是近代法律制度的出现。这是第二次全球化运动的转型。显然，19世纪之后中国的全球地位的转换，导致的自主发展的中国法律文明第一次以被动者的姿态迎接挑战，从而艰难地走上了转型与依附发展的道路。

然而，伴随着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特别是这场自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激荡，中国的全球位置与角色又在发生变化。正当亚洲金融风暴席卷而来之际，贡德·弗兰克在写作《白

“本书的新颖之处在于，通过分析证明，至少直到1800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直到1800年，具体到中国时东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他大胆地预言西方所取代，这显然也是暂时的，从历史角度看，这已经再次“调整方向”，中国正再次准备占据它直到1800世界经济占据的支配地位，即使不是“中心”地位。弗次世界性衰退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始于东方，然后其说是表明东亚的暂时虚弱，不如说是表明东亚基本经济正在转回到它在西方兴起前的位置。[11]人们从应付国际在发生权力自西向东的转移，并且发现今后若干年内很面向亚洲倾斜，而中国正是这种中心转移的一个中心点正在变成现实。正当人们因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而重新G2理论不径而走。所谓G2理论，简言之就是美中两极理论联手协调共同治理世界。不管这种理论的炮制者的意图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崛起及其在全球社会中的越来越重要的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份量。

据有关人士考证，G2的概念是由美国著名智库彼得雷德·伯格斯滕首先提出来的。在2008年《外交》杂志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像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没有承担起。国应该共同努力形成G2构架，共同领导全球经济体制。撰文，强调建立美中两极体制的重要性。哈佛大学经济，国在经济层面的相互依存性，并且创造出“Chimerica”-2009年1月中旬，在奥巴马正式宣布就职美国总统的前助理的布热津斯基，撰文向奥巴马政府建议采纳美中两2009年1月首次与胡锦涛主席的电话会谈中就把美中关系就连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和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呼吁美中应联手制定G2，带领世界走出经济困难，甚至断终将会令人失望。”当然，G2理论一出炉，便招来一片的目的，对G2理论进行质疑。[12]目前，围绕G2理论的

如何看待G2理论？关于G2理论的评论与全球化背景何关联？这显然是需要说明的。应当看到，G2理论甫一义色彩。鼓吹G2理论的人士宣扬美中两国共同领导世界责任论。也就是说，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应当承国家中扮演领导角色，正如美国在发达国家中扮演领导共同领导的全球两极体制，以便有效对付当前的国际金扩张和国际金融体制改革这样重大的全球结构性的问题制度、价值观、社会治理方式等方面的基本差异性以及际上，G2理论将把中国拴在美国这辆战车上，因而使中不相适应的沉重的国际责任，而影响本国的现代化进程舞台上的手脚，因而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丧失更多的回旋给中国设的一个陷阱。这并非毫无道理。尽管如今的中第三次全球化运动，中国赢得了加速发展的战略机遇，很不平衡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制约因素依然错综复杂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势头，加之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条件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量力而行。因此，这就决定了当代不当头的既定方针。认识到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透过G2理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方面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确实拥有了在世界舞这种更大更重要的作用的发挥，决不意味着某种强权而求霸权而成为霸权国家，而是要在这个千载难逢的重要当。当代的全球化运动，确实给当代中国带来了诸多机遇。因此，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改革进程，有助于维护国

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要着眼国家现代化全局，努力定国际规则、改革国际体系的话语权，抵制全球化进程又是有条件地参与全球性法律重构进程，以便更好地为此同时，要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与当代全球化进程相反演化与发展。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亦充分表明，全球发展艾。作为新兴的发展中的大国，当代中国在参与全球性化或全球共同治理名义下的法律帝国主义或新法律殖民律主权，更加积极地维护国家利益，更加审慎地运用好的长期战略目标，从而更加有力地回应国际金融危机之现代化的挑战。

### 三、制度反思与制度优势

人们在反思这场大半个世纪未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以总结分析。今年1月，在巴黎举行了“新世界，新资本齐、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等一批知名人代资本主义的命运与前景展开了热烈的论辩。一些学者主义的主导地位已经终结。这就是说，过去30年间，自系一直主导着欧美政府的经济社会决策行为。在这种自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顶礼膜拜。当1980年当选美当选英国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携手推出新自由主标是要矫正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30年间一直主导经济模式，重新确立亲市场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展示自的十多年的掌门人艾伦·格林斯潘秉承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系统也确实产生了效应，维持欧美经济体近30年的繁荣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金融与资产价格泡沫。与金融业相伴而生的，是全球宏观经济失衡以及愈益严重的金融。从1981年占国内生产总值22%，上升至2008年第三季度总额达到GDP的近250%。随着华尔街金融泡沫的破灭，重、最广泛和最危险的金融风暴便席卷全球。人们看到中，到处活跃着强大的政府的身影，“政府联手救市”术语。于是，许多评论家说道，一场金融崩溃与一次严重改变世界，一市场的正当性被削弱，美国的可信度受到已经结束。一些观察家注意到，随着政府发挥越来越大回归本国市场，“去全球化”（de-globalisation）的趋势挫。甚至有的学者大胆的分析，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与体制即将崩溃的统和新社会形态的出现，而伦敦G20金融峰会乃是新全球界政府的萌芽。总之，无论是何种见解，有一点似乎是度优势已经或正在丧失。

当然，一些学者不大认同上述看法。他们认为，资大。《大国的兴衰》的作者，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使人免于市场经济之前时代的束缚，也使人承受着金融以来，大多数明智的政府采取了防范措施，以防止公民而，经过这场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的形式会有所改变，的结论是资本主义有严重的缺点，但其他的制度更糟糕亚·森持有类似的见解。在他看来，现在谈论资本主义的局并不需要某种“新资本主义”，而是需要我们以开放范围及其局限性的旧观念。因此，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和变革的必要性。[14]随着当下经济复苏迹象的出现，不火重生。”比如，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杰弗里·加逊式的资本主义提出质疑，但是正在全速前进的盎格鲁·是这个世界想要的。毕竟，正是这个体系承载了过去30

时下的美国无法充任经济复苏火车头的作用，但仍然主导以及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资本主义。当然，为了保持再朝着更稳定的方向前进，美国必须进行深层次的结构变革，出一个新的全球金融体系。[15]在这里，尽管这些学者对资本主义制度充满信心与期待，但似乎都从不同的角度都能以一种新的形式活下来。这就进一步凸显了现行资本

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是，几乎与欧美推行新自由主义开始了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走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逐渐融入了正在蓬勃兴起的最后的今天，面对巨大的全球金融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的可信度受到损害，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际威信在上升。诚然，在过去数次全球经济衰退中，美国而这次却很难通过自身的经济力量来引领全球经济复苏。在这场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7%以上表示有可能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低谷。国际社会普遍发挥经济复苏火车头的作用，那么这个国家只能是中国。上这一奇迹般的发展道路呢？换言之，中国奇迹现象的制度优势。

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和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且平等，进而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富裕。”[16]良显然，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能的有机统一，其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有机偶合。这一模式集中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正义涵盖了社会价值系统的终极依托，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一会正义，就必须运用国家的力量，加强宏观调控，加大正市场的盲目冲动的趋向，制定切实可行的市场规则和市场经济生活，并且纠正各种违反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的健康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从总体上看，政府宏观亦日益健全，我们逐步找到了平衡协调公平与效率的法的发展，又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进而稳健地推进了社去的十多年里，一些欧美国家尤其是在美国，自由市场打开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下，令人融领域，犹如“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传奇投资者：投机和无止境的贪婪，埋下了巨大的金融风险，政府也模的经济与金融泡沫，酿成了这场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然表明了制度问题的决定性意义。

因之，推进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制现代化，必须高志，悉心把握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之间的互动机理，合的应有关系。在当代中国，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建设现市场与资本的效益需求，而且更要关切社会正义与平等，性，而且更加需要建立一个公正有序的市场竞争规则体要注重规范引导，不仅要致力于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财富经济与社会风险，一在这里，我们所需要的不是那种仅制，而是那种能够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把看不见有机结合起来并且带来公平与效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四、从“华盛顿共识”到中国模式

最近，英国《卫报》网络版（2009年6月23日）组：中国最终是否会成为“西方化社会”问题进行辩论，题

西方统治地位的寿数将尽了吗？”因这一辩论发生在国事关当代中国的未来发展和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前景说，按照《当中国君临天下》一书的作者马丁·雅克的看法，中国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但是不存在中国成为“西方化”完全不同的国家，实质上是一个文明国家，中国人主要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世界上的现代化进程是多种多样类型。将一切智慧归之于西方，这是西方极度傲慢自大大约始于18世纪末，在这个过程中将渐行渐弱。中国的升，这些新价值观念不会被西方价值观念压倒，而且肯冲突。与马丁·雅克的观点不同，《不祥之兆：21世纪的赫顿则坚持西方优越论，认为“文明国家”论是一种空种形式，那就是西方的形式。西方的主宰地位是永恒的迟早都必须采纳西方的制度、做法和价值观，否则就会机能障碍，其经济发展至少在实行政治改革之前是不能论发生在两位西方中国问题研究学者之间，但是它具有映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崛起现象的矛盾看法与复杂心态个基本问题，亦即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是多样的，还是单是否具有普世性价值？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终会走向样适用于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法制现代化问题的思考起大约一个世纪之前著名的韦伯命题和大约20年前的那们沿着这个思考之路朝前走吧。

马克斯·韦伯一生的学术旨趣，似乎在于探讨体现合社会兴起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设问：“一个在近代的欧洲文明中，世界历史的问题时，都不免会反躬自问：在西方文明中来的那些文化现象—这些现象（正如我们常爱认为的那和普遍价值的发展中，究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在于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其中一种是所谓具有系统严韦伯认为，包括理性化的法律在内的这些文化现象，都出来的。由此，他把西方社会结构的独特性看作是理解一把关键的锁钥，并且强调西方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在用是不一样的，它们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之，韦伯社会结构中的所有方面并非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那么又来自于哪些方面？回答是：“在这些方面中具有毋庸关的理性结构。因为，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机关只有在西方才处于一种相对来说合法的和形式上完又一次发问道：这种理性化的法律从何而来？他认为，理性的法律在西方社会出现的必然性问题，因为这些利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那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理性化道“在以上所有情况中所涉及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19]在这里，韦伯一连三个逐次的设问与分析，不仅揭示了理性化的法律在现代化的西方社会形成过程中的特殊了构成理性化法律的本体的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问题进程的唯一性与特殊性问题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那么竟何在呢？按照韦伯的观点，有两种类型的合理性，一合理性。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乃是一种工具的合理性或形资本主义法律的重要特征，现代法律体系和行政管理之纯粹形式的。这种体现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是西方社会出现过。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秩序和法律文明的质合理性，其法律形态的最大特点，就是关注实质原则。

约因素，决定了东方社会不可能像西方那样最早进入现代

从韦伯关于西方社会现代化起源以及理性化法律独  
韦伯不但关注现代化、理性主义及其法律为什么必然并  
代化、理性主义及其法律为什么不能够出现或者不能够  
者的一种反证，藉以说明现代化以及法律的现代化作为  
于或者首先产生于西方文明与西方社会的唯一可能性。  
代化的理论模式，始终围绕现代化以及法律现代化为西  
核心命题而展开。在韦伯那里，法律的理性化或现代化  
象，法律的现代性是西方法律的独有品格，那些仅仅存  
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而传统东方及中国的法律关注  
就成为传统中国法律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滞阻因素。显然  
化及其法制现代化的唯一性，忽视了全球现代化及其法  
“西方中心主义”的典型表现。实际上，现代化与法制  
品。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与法制现代化进程是丰富多彩  
着各个民族和国度文明成长与法律发展的固有逻辑，并  
制现代化模式，更不存在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与法制现代  
宿。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只要我们从本国的传统、条  
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与法制现代化的道路。

一个世纪以来，韦伯的现代化理论模式，成为西方  
导着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  
的现代化理论思潮。在这一学术背景下，一个以发展中  
法律与现代化理论或法律发展理论，在美国政府的支持  
国。有的学者甚至走出了书斋，来到一些发展中国家担  
方法典与法律经验，指导这些国家以西方国家（确切地  
推行法制改革，改造传统的习惯法体系，编纂成文法典  
代化。这些学者强调西方法律模式的普遍性意义，把法  
中国家法律体系移植西方法律而逐步“西化”的过程。  
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社会动荡加剧，  
场战争的失败，使人们对欧美世界的制度架构与价值观  
法律为模本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法制改革相继破产，  
人们对发展中国家移植西方法律的忧虑。在这种情况下  
代化理论以及法律与现代化运动进行批判性反思，试图  
化与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多样性，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采  
以满足对法典化的一时需要，却脱离了本国的文化土壤  
兴盛起来。

然而，随着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新自由主义  
说突出强调市场的力量 and 市场的自由化，认为政府的职  
场竞争秩序，主张废除对经济活动的种种限制。“为使  
化和市场自由化是必要的，国家也应该尽可能远离经济  
的这种观点可以概括为放松管制。放松管制意味着国家  
律和规定。放松管制和私有化、市场自由化已经成为有  
性’已成为所有重要工业发达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指针  
撒切尔政府时期，新自由主义从理论转化为政策，无论  
都深受这一理论与政策的影响。加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同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措施联  
义理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理论  
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据说，“华盛顿共识”  
约翰·威廉姆森在1989年的一次会议论文中最先使用的，  
丁美洲国家设计的各种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分母，主要内  
支出、税收改革、金融自由化、统一的竞争性的汇率、  
开放、私有化、缩小干预范围、保护知识产权等十项政  
共识”，是一种以私有化、市场自由化与放松管制为主  
的意识形态。起初，这一共识与观念体主要影响拉丁美；

斯。在“华盛顿共识”的支配下，这些国家推行激进的法”，其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灾难。但是，尽管疑，但是作为这一“市场原教旨主义”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相反却保持着强劲的势头，直到最近的这场严重的由主义思潮进行彻底的清算。于是，人们普遍断言，自由主义理论的破灭，标志着自由市场模式的死亡。当然为市场资本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发明的最好的经济制度水平。

近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在反思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市场模式的弊端，而且在认真地探讨中国发展道路的时代，他们频繁使用的概念术语。其实，前些年间，许多学者就模式进行总体性的分析。当时有一个流传较广的概念，（Consensus）。

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经济共识》一文，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藉此概念。在雷默看来，“华盛顿共识”的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发展的建议；而“北京共识”也可以称为中国发展的新事物。在发生的变化提供一个思想框架，有助于人们考虑后中国模式问题即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22]因之，所谓“北京共识”那么，如何界定中国模式？在这方面，学界各说纷纭。雷默即：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本质性特征，在我看来，关键在于把握保持社会活力。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中，社会主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自主性的自主性、创造性及自治功能，保持社会进步的生机。法治为模式，是中国现代化与社会变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法治首先就意味着社会主体自身的飞跃，主体的自主性逐步得律价值系统中来，就表现为社会主体的自由和权利在法治。法治为以法律为基础的具有高度自治型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主体的自主性，扩展社会主体的自治权能，保持社会进步。政府功能的弱化。中国是一个东方大国，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使公共管理功能的强大国家的存在，需要依靠政府的强大。之，邓小平谆谆告诫说，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中国拥有以法治为基础的强有力的国家能力和现代政府系统。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促进社会平衡发展的必要条件。[25]的中国模式的质的规定性。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自1949年人民大革命胜利以来的30年的不懈探索，中国逐步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重大转变，开辟了不同于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具有鲜明特色的发展模式。与此相适应，60年来，通过在经历着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深刻转型，逐步走上了现代的中国模式。在形成法律发展的中国道路的过程中，当吸收和采纳了反映市场社会运行规律的西方法律的有益律文明的通行规则接轨沟通。但是，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模式奉为金科玉律，没有照抄照搬西方的法制模式，而条件，努力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有效地避免了法律小平所指出的，“我们的现代化模式，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都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26]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只有从本国的国情条件出发，才运动方向，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发展模式。60年来模式的艰辛实践，历史性地生成了这一模式或道路的总力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实现对国家、社会与法治领导人民治国安邦的基本方略；强大的国家政权与权威型证明了中国社会与法制变革的平衡有序推进；不仅重视形

义，社会公平正义构成了社会与法律价值系统的终极依归；法律成为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有力工具；努力创造一个公正法愿望和尊严能够在这些条件下实现；在法律调整机制中，法律的创制与施行体现了鲜明的政策考量；在务实控地循序渐进地推动法律的变革与发展，等等。很显然或模式的上述总体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法史传统。这恐怕是韦伯式命题所无法涵盖的，是法律与的，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社会与法律发展模式所无法替

## 五、初步的小结

时下，人们日益关注后危机时代的国家发展与国家发展是关键，决定着国际体系转型与重构的走向，而影响力，并且作用于国家发展过程。一些人在预言，以被以威权主义为基础的中国模式所取代。有的学者甚至不仅值得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更应为发展中国家所汲取的“样板”。对此，我们应当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一见的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国模式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国，正在更加自信地参与治理金融危机的进程。在一定国际政治力量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也加速了中国崛起时代进程，打破了全球化、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神话，典教义，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模式的固有价值，增强了中于人们在说这场金融危机的“可能后果之一”便是中国会被视为已经声名狼藉的“华盛顿共识”的替代路线。醒地意识到，危机之后的国际形势更加迷离复杂。当今夜。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全球治理体系的虚弱与全球产家在改革与重建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同时，正在优化产图保持全球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以期应对以中国为首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发展，掌握国家间竞争的未来主势不可挡，但是制约中国崛起的国际国内因素错综复杂主义初级阶段，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相对落后的矛盾。从出口拉动型向内需主导型的经济转发展方式和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不断加剧，城乡之间的二重不平衡，等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束缚了中国崛起与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充满自信与信心的同时，地看到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洞察中国模式运行中国模式只能借鉴而不能复制，体味中国道路的艰辛与决心，努力化解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为中国崛起注不断增强中国模式的感召力、影响力和吸引力。

在当今的法律生活世界，全球性的法律重构进程在经济与社会的一体化正在以新的形态和方式展示出来。甚

G20伦敦峰会似乎预示着政治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进程提出了新的课题与议程，也对中国法律发展赋予了国正在崛起的背景下，推动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显一，在全球性的行为规则和法律机制的成型过程中，作的世界大国，中国必须进一步确立全球发展意识，关注参与全球性行动，塑造国际规范，创设国际制度，实施